



I210.97
283

3

沟通与更新

——鲁迅与日本文学关系发微

程 麻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808682

责任编辑：王中忱
责任校对：李小冰
封面设计：鹿耀世
版式设计：李玲玲

沟通与更新

GOUTONG YU GENGXYN

——鲁迅与日本文学关系发微

程 麻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北京新华印刷厂 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75印张 2插页 234千字

1990年 月第1版 1990年 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3 000册

ISBN 7·5004·0652·5/I·72 定价：4.55元

内 容 提 要

从比较文学、比较文化学的角度研究分析鲁迅与日本文学的深层关系，是本书的特色。作者既分析鲁迅与日本文学的直接联系，又考察日本沟通鲁迅与西方文化的中介桥梁作用，在辨析文学交流的复杂关系中间，对文学的现代价值观、人本体性质、伦理功能优势、创作心理动力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就比较文学研究的观点与方法，引申出发人深思的理论见解。

BH03117

目 录

- (1) 引言
- (7) 第一章 明治时代文化气氛和鲁迅的文学抉择
——中国现代文学价值观念的萌生
- (7) 一、鲁迅在留日期间走过了“科学救国”、“政治救国”的认识阶段，最后选定了“文学救国”之路——日本明治时代后期，人们逐渐重视精神问题，文学中“科学小说”、“政治小说”和“社会小说”、“面对国民精神的文学”等衍变——鲁迅受当时日本文学观念的影响，重视文学的独特精神价值。
- (19) 二、价值与文学价值观念界说——近代关于社会结构的学说，文学的精神生产性质和独特价值——鲁迅立志以文学改造人的灵魂，标志着中国近代文化知识结构初步完整，达到了与最新文化理论基本同构的水平——鲁迅在这种文学价值观念支配下的早期文学活动。
- (30) 三、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之间的不平衡发展——鲁迅在中国近代奠定了关于文学在社会生活中有与科学、革命相对独立的意义的观念——这一价值观念在中国

现代文学历史中的发展及其经验教训。

(40) 第二章 日本近代浪漫主义思潮与《摩罗诗力说》

——鲁迅对文学的人本体性质的追索

(40) 一、鲁迅早期曾象梁启超一样，从“工具”的角度理解文学的性质，后来则把文学看作人的灵魂表现、人的本体需求之一——鲁迅重视外国文学，通过文学可以窥探各国人民的精神和心理状态——《摩罗诗力说》是鲁迅追索文学的人本体性质的最初理论成果。

(48) 二、日本明治时代后期兴起人文哲学的潮流，这一哲学潮流在文学领域表现为浪漫主义思潮，这一文化环境推动鲁迅从人本体角度理解文学性质——当时日本赞颂德国和英国浪漫派诗人，及其对鲁迅的影响——鲁迅以浪漫主义文学观念批判中国文学传统的惰性，努力以文学激发中华民族的进取精神。

(60) 三、鲁迅与当时日本文坛一样，不满意屈原“怨而不怒”的风格，企望中国出现“反抗”的诗人——鲁迅褒贬拜伦、普希金的人格精神，旨在激发中国人的“反抗”意识——鲁迅从浪漫主义观念出发，推崇魏晋风度，他努力发掘魏晋文学中的积极内涵，为中国文学的新生做出了贡献。

(68) 第三章 鲁迅译介外国文学与日本之“桥”

——兼议中间环节在文学传播中的作用

- (68) 一、鲁迅继承并超越了林纾、严复的翻译风格，提倡保持外国文学作品本真面貌的直译标准，这是中国近代翻译观念中的巨大进步——鲁迅在翻译观念上的深化曾受益于日本近代文学翻译，日本之“桥”使鲁迅广泛接触了外国文学——鲁迅的注意力不再如林纾那样集中于英、法文学，而转向俄国和其他被压迫民族的文学。
- (77) 二、日俄战争后，俄国文学被日本文坛所瞩目，中国人在日本也接触到俄国文学——安特来夫的独特风格受到日本人和鲁迅的注意，鲁迅主要从作品风格的创新角度对安特来夫感兴趣——安特来夫的风格对后来鲁迅创作的影响。
- (85) 三、近代以来，弱小民族文学的地位问题被人们注意，鲁迅关注近代各国文学的不平衡发展现象——近代日本是亚洲各国革命力量聚集之地，民族解放问题是日本社会的重要话题——鲁迅以德文为媒介接触东欧被压迫国家的文学，并形成了不同凡庸的文学价值尺度。
- (94) 第四章 夏目漱石的讽刺精神与鲁迅的能动文学观——关于文学的伦理功能优势的探讨
- (94) 一、鲁迅与夏目漱石的因缘——夏目漱石觉察出中国古典文学与西欧近代文学的区别，鲁迅关于文学面对人生的主张——夏目漱石反自然主义的文学见解。

- (105) 二、夏目漱石不满足于文学反映“一次现实”，致力于发掘“二次现实”——夏目漱石的“余裕”和“低徊”风格——夏目漱石的积极讽刺精神。
- 三、鲁迅和夏目漱石都不局限于以文学反映现实，努力发挥文学的伦理功能优势——伦理功能的丰富内涵及其与认识功能的联系和区别——鲁迅对夏目漱石文学精神的继承和发展，他以宽泛的伦理眼光超越了中国文学的道德训诫传统——中国文学史中对文学认识功能的观念有待深化。
- (133) 第五章 白桦派文学和鲁迅改造国民性的实践
——谈人道主义的人格标准意义
- (133) 一、五四时代中国文坛对日本白桦派的关注——鲁迅因看重人道主义而译介白桦派作品——鲁迅把人道主义看作国民性改造的人格标准。
- (144) 二、人道主义思想的形成及其多层次内涵——鲁迅在人格标准的意义上肯定有岛武郎的作品——鲁迅看重彻底无我的、超狭隘功利的“爱”心。
- (155) 三、鲁迅把人道主义的价值限定在观念和心里的范围内，反对将人道主义武器滥用到社会改良实践中——人道主义在文学艺术领域的特殊意义——鲁迅不因阶级斗争观点而根本否定人道主义思想。
- (169) 第六章 日本历史题材小说和《故事新编》

- 文学题材和意蕴的互补关系试析
- (169) 一、日本近代文学中的史传小说和历史题材小说——日本近代历史题材小说的发展脉络——鲁迅对森鸥外、菊池宽和芥川龙之介等历史题材小说的重视和译介。
- (180) 二、近代历史题材小说出现的时代文化背景——芥川龙之介在日本近代历史题材小说发展中的贡献——历史题材和现代主题的相互制约关系。
- (190) 三、鲁迅借鉴历史题材小说观念创作了《故事新编》——鲁迅的历史题材小说的“油滑”风格，是一种文体特色——从历史题材小说观念中导引出的文学问题，体裁与文体的辩证关系。
- (203) 第七章 《苦闷的象征》和鲁迅的文艺心理学思想
——论文学创作的心理动力问题
- (203) 一、近代文艺心理理论的生成及其在东方的传播——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在日本文学理论发展中的地位——中国现代文坛对文艺心理问题的关注和鲁迅译介《苦闷的象征》的动机。
- (212) 二、厨川白村的文艺心理观点对近代心理学成果的借鉴和改造——文学创作的心理动力来源于苦闷的三个科学依据——幸福是痛苦的反衬效应。
- (223) 三、心理动力与动机的联系和区别——动机的心理、社会和精神三种指向——精神动机

与文艺创作的关系——象征范畴在文艺心理学中的意义。

- (229) 四、鲁迅初步的文艺心理学思想的六个基本内容——鲁迅对《苦闷的象征》的基本态度。
- (238) 第八章 日本随笔和鲁迅杂感
——文学体裁的模糊性质辨正
- (238) 一、风格从容委婉的日本传统随笔，在近代变得俏皮起来——长谷川如是闲的随笔创作成就和日本文坛上对其体裁归类的争议——日本现代文坛对体裁的开放性眼光。
- (247) 二、中国现代随笔的兴起，鲁迅对这一本体的杰出贡献——鲁迅对日本随笔的反教条姿态的借鉴——鲁迅继承中国散文传统，创造了具有独特风格的新型杂感。——应从“内在形式”的角度看待鲁迅对杂感体裁的冲击。
- (257) 第九章 日本普罗文学和中国革命文学论争
——鲁迅探求无产阶级文艺政策科学性的启示
- (257) 一、中国现代关于文学与政治关系上的“左”倾观点，其与俄国“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关系——中国二、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论争——日本普罗文学运动对中国现代革命文学的影响。
- (266) 二、鲁迅基于对文学本质的独特理解，能比较辩证地认识文学和政治的关系——革命借

助于文学之力，反映了无产阶级政治观念的不成熟——鲁迅反对把文学界定为政治的工具。

- (276) 三、鲁迅重视苏维埃政权扶持文学事业的政策——阶级斗争对文学的薰染和影响，但文学不应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命题的逻辑错误——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的“左”倾错误的深刻教训。
- (286) 第十章 鲁迅的横向文学移植与更新文学传统的努力

——文学影响的时空统一性阐释

- (286) 一、鲁迅深化了林纾、梁启超等人的文学比较观点，试图借助外国文学以推动中国文学传统的更新——鲁迅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欧洲浪漫派文学，吸收其崭新的个性反抗精神——横向文学移植与纵向推进文学发展二者不可分割，“时过”与“境迁”相互制约。
- (294) 二、倾重于空间意识的比较文学研究，不应忽略时间观念——中外文学的横向区别，也蕴含着纵向历史水平的差异——日本近代文学的横向开放姿态，中国古代浪漫精神的未充分发展需要外力的激励。
- (301) 三、文学外在关系上的时空统一性与文学本质中的内在时空统一性二者的联系和区别——文学的内在时空统一于无限性及其现代科学依据——鲁迅从青年时代注意以文学沟通古今中外的人类感情和心灵。

(309) 第十一章 比较思维方式和文学研究的变革

——引申性思索

(309) 一、比较文学研究面临理论方向的抉择，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应进行创造性思索——文学研究从演绎方法开端，近代重视归纳方法，比较方法是后起的思维方式。

(316) 二、“影响研究”只重视文学的统一性和可通性——“平行研究”重视共性而过滤了个性特征——文学研究应以充分的个性特点为着眼点，才是深刻的和可信的。

(325) 三、比较文学的注意力正从必然性转向偶然性，从单一转向复杂，从统一转向差异——只有充分尊重个性，才能归纳出科学的文学规律——采用比较方法，是为了寻找更快接近理论目标的最佳途径，不该因方法而淡漠了文学研究的目的。

(333) 后记

引 言

笔者写这本论著的初衷，是想在鲁迅研究领域尝试开掘一隅新田地：尽可能全面地清理鲁迅与日本文学的关系；借以将鲁迅还原到近现代东西方各国文学相互沟通、彼此交融的时代背景中，展示他在中国文学观念更新历程上的先驱者形象，并淘漉或引申出今人可引以为鉴的理论教益——如书名所标示的那样。而有的同志读过书稿，便批评指点，说这属于比较研究。

这也许可算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之一例罢。我起初并非是从研究方法，而是着眼于鲁迅与日本文学的关系相当密切和复杂，才对这个课题感兴趣的。确实，关于鲁迅和日本文学之间，值得思索、推敲之处颇多。例如：

鲁迅立志学文与日本明治时代的文化气氛以及文学状况，有哪些内在的联系；

鲁迅写作《摩罗诗力说》时，曾借鉴日本文学中的哪些观念；

日本文坛曾对鲁迅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起过什么作用；

鲁迅为何共鸣于夏目漱石的作品；

鲁迅出于什么动机，在五四时代译介白桦派的文学作品；

鲁迅的《故事新编》和日本近代的历史题材小说有何

因缘；

鲁迅译介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对东方文艺心理学的建设有什么意义；

日本近代的随笔对鲁迅的杂感创作是否有过推动；

鲁迅在“革命文学”论争中，曾涉及到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他的评价如何；

进一步说，以鲁迅和日本文学的关系为例，目前的比较文学研究应有哪些深化；

诸如此类，等等。

以我的感觉，鲁迅与日本文学，大体是一种“无为有处有还无”似的扑朔迷离的状态。要说外国文学对鲁迅影响最大的，怕要推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相比之下，鲁迅对日本文学的看法和态度，便复杂得多。他在思想锐利、敏而好学的青年时代留学日本七年之久，而且是在那里开始走上文学之路的，耳濡目染，无疑会对日本文学有熟稔的感受和深刻的理解。他曾热情肯定日本文学中的某些东西，并自称过是向中国文坛“贩卖日货的专家”^①；可在特定情况下，他又慨叹说：“我觉得日本作者和中国作者之间的意见，暂时尚难沟通，首先是处境和生活都不相同。”^②当然不能说鲁迅对日本文学冷淡或隔膜，但如认为他是无条件地汲取，更是简单和皮相之谈。勿宁说，正是这看似矛盾的种种态度，相反相成地体现了鲁迅与日本文学之间的关系的丰富内涵。这是一种出于深悟日本文学的神髓的分析和扬弃精神。

其实，即使是武断过鲁迅“对日本文学当时殊不注意”的周作人，也曾承认他对日本文学是区别对待的。按周作人的

① 鲁迅致山本初枝，1936年10月19日。

② 鲁迅致增田涉，1936年2月8日。

印象：鲁迅在留日期间，“对森鸥外、上田敏、长谷川二叶亭诸人，差不多只重其批评或译文，唯夏目漱石作俳谐小说《我是猫》有名，豫才俟其印本出即陆续买读，又热心读其每日在《朝日新闻》上所载的《虞美人草》，至于岛崎藤村等的作品则始终未曾过问。自然主义盛行时，亦只取田山花袋的《棉被》、佐藤红绿的《鸭》一读，似不甚感兴味”。^①这一回忆中所说的情形，与后来鲁迅对日本绘画的评价，是基本吻合的，即：

关于日本的浮世绘师，我年轻时喜欢北斋，现在则是广重，其次是歌麿的人物。写乐曾备受德国人的赞赏，我读了二三本书，想了解他，但始终莫名其妙。然而依我看，恐怕还是北斋适合中国一般人眼光。^②

与鲁迅对日本绘画的评价相类似，他对日本文学的感受、筛选和取舍，他所受日本文学的薰陶与滋养，既是出于中日两国人民共同的心理需求和艺术情趣，更是为了中国文学传统的再生与更新，以加速其现代化的进程；除此之外，还应注意日本文坛曾是鲁迅接触西方文学的“桥梁”这一特殊的历史情况，等等。也许只有把这些侧面全都顾及到，才称得上是鲁迅与日本文学的关系的全部内容。显然，这种复杂、丰富的内容，并不是比较文学研究中单一的“影响关系”或“平行关系”模式所能囊括和穷尽的。可是，毕竟研究方法是为研究对象服务的，而不是相反，所以，我觉得，正视和深入剖

① 周作人《关于鲁迅之二》，《鲁迅先生纪念集》，上海书店，1979年复印本。

② 鲁迅致山本初枝，1934年1月27日。

析这种复杂的文学关系，不啻是我们摆脱昔日比较文学研究狭隘眼界的束缚，超越浅薄境地的绝好动力。它是值得认真发掘和琢磨的。

比较文学研究，迄今迈出了法国式的影响研究与美国式的平行研究两大步，它推动文学研究走过了历史上由传统的演绎和归纳方法先后称雄的时代，开始展现出一种新的研究学科和文学观念的雏形，其进步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在这个呱呱落地不久的“新生儿”身上，还不能不暂时带有一条与传统文学研究的“母体”藕断丝连的“脐带”，即追求“相似”或“一致性”的意识和观念。看清这一点，也许会使人们更准确地理解比较与演绎、归纳等思维方式的区别及其出路。人类早有的演绎方法，以世界万物的“统一”为基本观念，它最热衷于“人同此心，物同此理”的信条，喜欢用一神圣的标准去涵盖和衡量外延，排斥掉所有的异质现象。所谓“诗言志”，所谓“文学是摹仿”，这些判断都不无道理，可古人试图以如此单一的概念囊括所有现象，便显得幼稚和武断了。后来的归纳方法就较为聪明和灵活，它尽管也以抽象“相似”或“一致”的性质为最后目的，但毕竟承认事物纷纭复杂的“相异”和“不一致”性是认识的前提条件。这无疑是人类思维的一大深化。而近代兴起的比较思维方式，作为对人类已往思维机制的继承，它并不完全拒斥“共性”观念，只是它更强调个性对共性的制约作用，是人们越来越重视事物特征和独有价值的表现。这是一种比从前提性的“统一”观念出发进行演绎，或综合抽象出“共性”的归纳方法都更辩证，也更无教条味道的开放性思维路线。人们说“有比较才有鉴别”，固然也是为了寻觅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似”或“一致”之处，但其根本的宗旨，却是要警示：

人们不应当再拿某种不以个人为转移的tertium comparationis[用作比较的根据即标准]来衡量自己,而比较应当转变成他们的自我区分,即转变成他们个性的自由发展,而这种转变是通过他们把“固定观念”从头脑中挤出去的办法来实现的。①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创始人对“比较”方法的精髓和本质的这一揭示,不啻是对人们固有的迷恋、推崇“统一”和“共性”的思维定势的巨大冲击。正是基于对比较思维方式这种内在精义的领悟,马克思才主张:“要了解一个历史时期,我们必须迈出这一时期的局限,把它同其他历史时期进行比较。”②而恩格斯,甚至曾有意将比较方法用在文学研究里,说:“任何一个人在文学上的价值都不是由他自己决定的,而只是同整个的比较当中决定的。”③

值得庆幸的是,经历过法国的“影响研究”和美国的“平行研究”阶段,近来有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已不满足于在追寻不同国家和民族文学的共性或相似之处上浅尝辄止了。人们在注意同质或近似同质的文学现象之外,努力把视野拓展到异质关系、矛盾关系以及其他更复杂的文学关系方面,“比较”的概念早不象过去那样简单和浮浅。例如有人已宣称:“‘类同研究’作为一种方法学而言,只是要求在选择比较题材时,要有其类同性,作为比较研究的基础,就犹如影响研究之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8页。

②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与帕麦斯顿的生平》,《马克思和世界文学》,三联书店,1980年,第35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24页。